

**乡村记忆**

# 吃一回“松狗子蛹”有多难

于建亭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松毛虫，又名火毛虫、毛毛虫，我们家乡人都管它叫“松狗子”，它结茧后化的蛹就叫做“松狗子蛹”，那可是吃过一回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美味。

松毛虫多为灰褐色，其周身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毒毛。当它结成茧子后，身上的毒毛仍保留在茧子表面，人的皮肤一旦触碰到，立马就会起一片红扑扑的大疙瘩，并伴随着灼痛和奇痒，和它打交道那可不是好玩的。

松毛虫的幼虫在松树皮里过冬，天气暖和后就爬出来啃噬松针长大。每年过了农历的六月六，松毛虫就陆续开始结茧化蛹了。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山里人都会为了吃上“松狗子蛹”忙碌一阵子。

用剪刀或镊子把松茧从树上扯下来，用平话来说就叫“铰松狗子蛹”。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营生，为了不使它的毒毛弄到身上，不管天气多么炎热，都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衣裤，尤其是袖口处还要用布条扎起来。中伏天，进了幽深的山夼里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头顶上是火辣辣的太阳，又热又闷，那滋味可真是不好受。一旦遇上连阴雨天气，村里人简直就高兴坏了，一个个急溜溜地披上蓑衣或麻袋皮，戴着草帽往山上跑。下雨天不仅凉快，而且松茧被雨水淋湿了，它的毒毛就飘不起来了。

松茧铰回家，把“松狗子蛹”从松茧里取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通常是把松茧拿到远离村口的空旷场地，用几块石头支起一个简易灶口，放上一块筛底状的大铁板，然后把松茧倒上去用木棍摊铺开来。一切就绪，就在铁板下点燃麦秸草。旺旺的火苗从铁板的空洞冒上来，就把松茧的表皮烧糊了。这时候要用水棍不停地拨弄松茧，使其表面全部都被火烧遍。眼瞅着烧得差不多了，就用两根木棍把铁板端下来，把松茧倾倒在一旁的地面上，然后再一次次重复上述的过程。

等把所有的松茧都烧燎结束，就用筷子把“松狗子蛹”一个个挑拣出来。拣的时候要双手各持一双筷子，左手的筷子压住烧糊的松茧壳，右手的筷子则负责把“松狗子蛹”拨出来，再搛进铺着牛腿瓜叶子的小篓里。

“松狗子蛹”都拾掇利索后，就用麦秸草把松茧壳焚烧干净，然后挖个坑把灰烬埋进土里。如果做不好这一步，村里人就会批评你不通情理，贻害他人。

“松狗子蛹”要拿到大河里冲洗干净。首先把盛着“松狗子蛹”的小篓在河水里使劲抖动，里面的杂质就随着滔滔的河水漂走了。接下来，还要用牛腿瓜叶子在“松狗子蛹”上反复搓擦，就把“松狗子蛹”上的毒毛吸附下来了。事前要准备好多牛腿瓜叶子，这样的搓擦要重复好多遍，搓擦得越仔细，“松狗子蛹”就越干净。

那时候没有胶皮手套，这每一步操作无论多么仔细，手上还是会粘上毒毛。记得妈妈每次忙活完这些营生，都是用稀释的碱水把双手浸泡一会儿，可还是会痒又痛好多天。

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炒“松狗子蛹”了。把“松狗子蛹”倒进大锅后，要添加适量的食盐，然后，一个人慢慢烧着麦秸草，连风箱也不拉，让火苗弱弱地“呼啦”着就行。看锅的人则要用锅铲子一刻不停地翻动着“松狗子蛹”，如果翻动不及时，最底层的“松狗子蛹”就要被炒糊了。随着锅铲子“哗哧哗哧”地在锅里翻动，一股浓郁的香味就慢慢在屋里弥漫开来。

“松狗子蛹”又嫩、又香、又鲜，实在是好吃得不得了，和柞蚕蛹比较起来，其味道更胜一筹。其中最好吃的是那些还没化成蛹的松毛虫，用剪刀沿着其脊背剪开一道口子，扒出里面白嫩嫩的肉，那种鲜美的滋味实在是形容不出来。

在我们村有个传统习惯，家家户户吃“松狗子蛹”这顿饭，都要煮一锅菜豆苞米面咸饭。吃着“松狗子蛹”喝着咸饭那是绝配，那种别具一格的好滋味，保证能让你吃个大肚溜圆、饱嗝连连。要是赶巧从山上拣回来一些新鲜的野蘑菇，洗净后切片添加到咸饭里面，这顿饭就会格外多了几分好滋味。

不过，吃“松狗子蛹”的时候一定要仔细，把每个“松狗子蛹”尾部的尖尖掐掉，因为那上面始终黏附着一点点毒毛。可即便再仔细，吃完饭还是会有点嗓子眼发痒、舌头根子发硬的感觉。就因为这，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句常用俗语：“别光顾得‘松狗子蛹’好吃，有你舌头根子发硬的时候。”久而久之，这句话就衍生出了另一层意思：当某些人得意忘形时，就会有人借用这句话来怼他。

吃一回“松狗子蛹”太不容易了，我13岁那年的一段经历，更是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那是1964年的中伏天，姑姑从石家庄赶回来看望病重的奶奶。妈妈想铰点“松狗子蛹”给姑姑吃，可因诸多家务缠身，一直腾不出手来，就把这事交给我了。

那天一大早，我就带着小铁桶和剪刀上山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也曾跟着妈妈干过这营生，可都是跟在妈妈身边，随时得到妈妈的指教和关照。这次自己单独行动，就有点力不从心了。那时我还没有1.6米高，而大多数松茧都在高高的松枝上。要把松茧扯下来，就要先跳着高把松枝扳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就会有一些毒毛散落到身上。时间不长，我的手上、脸上、脖颈上就又痒又痛，真有点吃不消了。越是心烦意乱越容易出差错，一不留神，一个从高处扯下的松茧一下子掉进了衣领里，我紧张地一抖搂，松茧顺着胸口滚了下来，胸脯上立马就起了一长串红扑扑的大疙瘩。

直到过了晌午好一会儿了，我才大汗淋漓地提着大半铁桶松茧回家了。当我脱了衣服露出被毒毛蜇起的一片片红疙瘩，姑姑抚摸着我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，硬是塞给我两元钱。

后来，开始用飞机撒药防治松毛虫，“松狗子”慢慢地就绝迹了。时至今日，“松狗子蛹”想吃也没有了，只留下这些故事。

**往事如昨**

## 老冰棍的味道

姜德照

今年的夏天感觉比往年格外热，久违的雪糕也开始吃了起来，我经常到商场批发一些放到冰箱中。每次拿回家，都是儿子接过去，放进冰箱的冷冻抽屉中。在放之前，他翻看了我买的雪糕，对我买的那些六七元钱一根的雪糕，说一声：不错。妻子去商场回来，说那里的雪糕太贵了，四五元一根，我和儿子相视一笑，也不解释。

我和妻子小时候吃的都是冰棍，那时候冰棍的外包装纸上写着“老冰棍”三个字，与现在那些千奇百怪的高档雪糕截然不同。“老冰棍”的价格很亲民，今天的孩子和年轻人不会去问津“老冰棍”，“老冰棍”代表着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。

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，小时候的夏天，能吃上冰棍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。那时的农村，偶然才有走街串巷的商贩推着自行车，车后面驮着一个上面蒙盖着棉被的箱子，嘴里吆喝着：卖冰棍来——孩子们看见了，就跑回家，和爸爸妈妈要零花钱去买上一支，那时候的冰棍也不贵，几分钱一支。到了卖冰棍的人面前，他会掀开箱子上面的棉被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一支，然后赶紧把箱子关紧，把棉被重新包裹上，这箱子就是那个时代简易的保温箱。孩子们买到冰棍，立刻揭开冰棍纸一扔，伸到嘴里咂摸起来，脸上满是笑容。

我最难忘的一支冰棍，还是7岁那年的夏天，在烟台机床附件厂上班



的伯父买的。那天傍晚下班后，伯父带我在工厂食堂吃完饭，然后用自行车驮着我，到老烟台的南山路，在那附近的一家书店买回一些书。一出书店门，我突然看到马路旁一位老奶奶坐着小板凳在卖冰棍，城市人卖冰棍与那些在农村吆喝的人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大箱子，而是用一种比较粗的暖瓶，里面装着冰棍，每卖出一支，还会剥开冰棍纸，放在脚下的方便袋中。见我被冰棍吸引住了，伯父就停下自行车，给我买了一支，那是二分五的冰棍，他自己竟没舍得买。那支冰棍的味道我至今难忘，一放到嘴里，先是一阵凉爽充满全身，而后是那种甘甜的味道。我不舍得大口大口吃，而是一次次放到嘴里用舌头舔，直到冰棍快融化了，才完全吃到嘴里。那一次，我不舍得马上丢掉冰棍的木柄，在嘴里咂摸了好久上面的甜味。

有一年，伯母领我去大连的舅舅家，在那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电车，伯母还给我买了一支冰棍。那可是大冬天，大连的冰棍味道与以前在烟台吃的不一样，像是用老桃酥水做的，一口老桃酥味，而且在那么冷的冬天，一点也不感觉凉，因此我对那特殊味道的冰棍一直难以忘怀。

“老冰棍”承载着一个久远时代的回忆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，还是习惯偶尔买上一支“老冰棍”，在咂摸中回味那曾经的岁月和那些永不消逝的记忆。

## 从叛徒“马家辉”说起

杨文革

85岁的妈妈在电视上看老电影《党的女儿》，看到剧中的叛徒马家辉，顿时来了兴致，给我讲起两件她当年亲历的趣事。

妈妈20多岁的时候，在海边的一所村小学里教二年级。一天下课后，两名男孩子在教室里不知为何打起来了，同学们拉都拉不开，班长跑着去办公室把妈妈找来了。妈妈来到教室，这两名男孩还在用语言互相攻击对方。个高的小明骂个矮的小强叫“马家辉”，小强就骂小明“花花烟袋杆”。两名男孩的互相叫骂，让妈妈和所有同学听了都一头雾水。

妈妈把这两名男孩叫到办公室，问他俩为何这样称呼对方。小明说，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，在两个人好的时候，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一个小秘密，并承诺不和任何人说。今天两个人为一点小事闹掰了，所以秘密也就不是秘密了。

妈妈问小明为何称小强是“马家辉”，小强的名字也不叫“马家辉”呀。小明说小强经常爱打同学的小

报告，有人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马家辉”，就是电影《党的女儿》中的叛徒。妈妈又问小强，你又为什么叫小明“花花烟袋杆”呢？小强说小明家有四个哥哥，没有闺女，他妈又稀罕闺女，从小把小明当闺女养，给他穿花衣裳，但是他又是男孩，所以有了外号“花花烟袋杆”。

在妈妈的教育下，两名男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和好如初，但是“马家辉”和“花花烟袋杆”的事，当时被当作趣事传开了，如今我听了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妈妈见我高兴，又讲了另一件趣事。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，物资匮乏，妈妈的邻居是一对老农民夫妻。一次老两口收到儿子寄来的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爹同志娘同志，爷爷奶奶老同志。社会主义一枝花，各人挣钱各人花。”当时，老两口看了非常生气，认为儿子这是不孝，当即回信说：“儿同志媳同志，孙子孙女小同志。社会主义就是好，养老钱一个也少不了。”听了这个故事，同样让我忍俊不禁，笑出了声。